

1950年,徐州到武汉的搬迁之路

1950年,徐州铁路工厂的680名职工和3000多名家属,随工厂搬迁到了武汉,从此留在那里,形成了如今武汉城里的“徐州新村”。

这些职工和家属们当年是通过什么方式到达武汉的?徐州铁路工厂为什么要整厂搬去武汉?他们到了那里后是如何安顿生活和生产的?为什么这个工厂的宿舍区最后会成为武汉的“徐州新村”呢? □本版主笔 见习记者 郑文静

全厂迁武汉 工人、家属和机器同搬

徐州铁路工厂兴建于1913年,在当时是陇海东段最大的机车厂,有工人数百名。1921年11月,反抗洋人欺压的“八号门事件”就发生在此,而由此引发的陇海铁路全路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所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罢工斗争。

到解放前夕,全厂每月可大修机车一台,客车三辆,货车七八辆。解放后,为了修复被国民党用炸药炸毁的生产设备,工人们从家里带来工具,从泥土里翻出部件,在被毁坏的厂房里冒着风吹雨打抢修了机车“徐州青年号”,时速达70公里。

1950年7月,根据国家调整铁路工厂布局的指示,郑州铁路管理局决定将徐州铁路工厂迁

往武汉,与当地的江岸铁路工厂合并,建立“江岸车辆厂”。

当时还专门成立了江岸工厂迁厂委员会。委员会具体分为三组:一是政工组,负责团结、宣传、教育工作。二是运输组,负责将徐州铁路工厂的机器设备和职工、家属等迁往武汉。三是建厂组,负责修建武汉当地的厂房及住宅工程事宜。

1950年12月10日正式开始迁移,按照“人与器材同搬”的原则,分8次迁往武汉。

与当地工厂合并为“江岸车辆厂”后,全厂职工达1646人,机械设备594套,生产能力大幅提高。1951年,工厂修理机车78台,修理客车60辆,货车修理能力比上年提高了2.6倍。



徐州铁路工厂的工作场面



武汉江岸车辆厂铜章



江岸车辆厂的1650吨水压机



“二七大罢工”中牺牲的林祥谦



“徐州新村”职工医院里的手术场景
以上均为资料图片

坐闷罐子车 3天3夜才到达武汉

在1950年第一批由徐州迁往武汉的火车上,有一户工人家庭,是夫妻俩带着一双儿女,儿子叫姜体发,才四五岁大,小女儿刚满周岁。

他们乘坐的火车原本是装货用的,封闭式,中间开门,两米多高的车厢壁上有小小的通风窗口。在客车车厢短缺时期,代替客车车厢使用,也就是人们俗称的“闷罐子车”。

“闷罐子车”里不仅有姜体发的家人,还有从徐州带出来的家当,包括黄泥巴和稻草造的炉灶、用来和面的案板、用来睡觉的铺板,还有水缸、大黑瓷碗、矮桌子和全家人的衣服。根据组织

的指示,衣服带得不多,冬夏各两套。

一节车厢一般运两户人,和姜体发同一节车厢的人家姓周,夫妻俩带着5个孩子。

孩子多了,自然就热闹,可是这7个孩子只能在这节小小的车厢里活动,不能下车。一是因为火车途经的地方大多还很荒凉,并没有玩耍的地方;二是出于安全考虑,毕竟国家初定,在外面乱跑不安全。所以,孩子们如果想透气,最多只能站在车厢门口看看外面而已。

就这样,两家人和两家的日常家当,在这列慢悠悠的闷罐子车上挤了3天3夜,才到达武汉。

住泥巴屋子 手工抡大锤恢复生产

武汉当地等待合并的工厂,叫江岸铁路工厂,位于长江边上的荒凉地带。1922年到1933年,著名的“二七大罢工”最壮烈的部分就发生在这里,当时牺牲的烈士林祥谦正是这个工厂的工人。但是,拥有光荣历史的工厂却在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破坏了,设备能搬走的搬走,搬不走的破坏,只留下破败的厂房和迫切希望恢复生产的职工。

徐州的工人们乘着火车到来,和当地的武汉工人一起投入了恢复和生产工作。

厂房破败怎么办?那就顶风冒雨。没有机器设备怎么办?那

就手工抡大锤。没过多久,硬是靠着徐州工人和武汉工人的双手,将生产恢复了。

然而,最艰苦的不是工人,而是陪伴工人们迁来武汉的徐州家属们。他们就住在工厂旁临时搭建的过渡房里,每户人家分一间,房子的顶是高粱秆子,墙壁是泥巴糊竹子,屋里什么都没有,想睡觉就只能睡在徐州带来的铺板上。男人们都得出去干活,女人们没有工作,就只能在回家烧饭带孩子。

用手也用脑 出了个全国劳模范忠志

姜体发的爸爸是厂里的铆工,负责给火车打铆钉。每天清晨,厂里的喇叭吹起冲锋号,工人们就起床从宿舍前往工厂上班,中午休息时吹第二次,下午上班吹第三次,晚上下班吹第四次。每当喇叭吹休息号的时候,姜体发就和小伙伴们一起去厂门口接爸爸。工人数量多,厂门口的孩子也多,场面总是很热闹。

后来,厂里给家属们找了一些烧煤、卸煤的差事,工资只有几分钱一天,姜体发的妈妈也去了,而且中午不回家吃饭。所以长大懂事的姜体发就在家照顾妹妹,等到午饭时间就把妈妈早上做好的饭热了给妈妈送去。

在工人和家属的辛勤劳动中,江岸车辆厂的生产逐渐发展起来。发展当然不能光靠体力,还要

靠脑子。当时的江岸车辆厂里,就出了个喜欢动脑子的全国劳模范忠志。

范忠志出生于1911年,解放后在江岸车辆厂当车工,他进识字班扫了盲,凭着勤学好钻,用自己的双手研制出了一台切管机,代替手工操作,功效提高了12倍。之后,他又攻克了许多高级工程师解决不了的难题,一生实现大大小小的革新项目两千多项,三次荣获全国劳模殊荣,被称为“工人工程师”,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当时还年轻的姜体发记得,这位个子不高、笑起来憨厚和气的叔叔,1971年在没有任何技术外援的情况下,带领革新小组研制出了大型设备——1650吨大型水压机,大大提高了江岸车辆厂独立自主的生产能力。

建徐州新村 配有学校、医院和澡堂

除了恢复生产,新建家园也是重要工作。1950年至1957年,江岸车辆厂的基建工作主要就是建设职工住房和后勤设施。

1952年,工厂在厂外建造了10排平房,建筑面积3810平方米,命名为徐州一村。1953年,建了徐州二村,建筑面积515平方米。1954年建了徐州三村和四村,建筑面积6848平方米。之后的几十年里,这四片宿舍区随着工厂的发展而不断扩建,最终成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社会,被称为“徐州新村”。

一起建设起来的还有工厂附属的医院、学校、澡堂、俱乐部、体育中心等。

当时,在“徐州新村”的医院里,工厂职工看病是不要钱的,家属看病可以出示铁路职工家属证半价优惠。在“徐州新村”的学校

里,有小学,也有中学,小学一到六年级共有一二十个班,教语文、算术、音乐、体育还有画画等课程。

在“徐州新村”的俱乐部里,有一个能容纳千人的电影院,会演文艺节目,还会放电影,电影票5分钱一张。

大人们上班后,孩子们独自在家,就喜爱去电影院看电影。姜体发也很爱去,而且最爱看《南征北战》这类的打仗片。

他还很关注广播喇叭,因为喇叭里会通知今晚播放什么电影。如果是他喜欢的,他就跟爸妈要5分钱,有滋有味地钻进电影院里看。有时候实在没钱,他就跟小伙伴想办法偷溜进去,当然有时候会被逮住,因为电影院的人也是工厂家属,都认得,就会直接把他拎回父母身边,让他觉得很不好意思。

融入了当地 说武汉话娶武汉的姑娘

时间过得很快。1965年,爱玩推铁环、爱看电影、会接爸爸下班的姜体发已经初中毕业,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

跟父亲一样,姜体发走进江岸车辆厂做了一名铆工。当时的铆工,得三个人配合着做。一个人负责把铆钉放进大火炉里烧红。第二个人负责用铁漏斗接住刚出炉的铆钉,送给第三个人。姜体发是第三个人,他将火车铁架子上需要连接的地方砸出洞,然后把通红的铆钉打进去。他还娶了自己小时候的玩伴,一位同样来自徐州,在武汉长大的,在武汉念书的姑娘。

“如今我的父辈人,大多年事已高,很多人都离世了。像我这样

作为孩子跟过来的第二代,也基本都是五六十岁退休的人了。再往下我的孩子们,都出生在武汉,和当地人已经没有什么区别。”如今已经65岁的姜体发回忆起少年时代的岁月,恍如昨日。

“最初的时候,厂里的徐州人跟当地的武汉人是不通婚的,一般都愿意找徐州来的老乡,因为我们听不懂武汉话,武汉人也听不懂我们的徐州话。后来时间久了,跟当地人交往多了,关系就融洽起来,语言什么的也都不成问题了。”

姜体发说,自己的大儿子就找了一位湖北姑娘,两个人同在一个车间上班,“只要人好,是不是徐州人都没关系了。”



1950年,徐州铁路工厂的工人和家属们坐着火车来到武汉,组建了武汉的江岸车辆厂 快报记者 辛一 摄